



困境与危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危机研究

吴 永 / 著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困境与危局

——试论中国共产革命胜利后面临的困境

何一勇 著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

困境与危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危机研究

吴 永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侯 春

装帧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困境与危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危机研究/吴永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

ISBN 978-7-01-013863-3

I. ①困… II. ①吴…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1935~1948

IV. ①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4616 号

困境与危局

KUNJING YU WEIJU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危机研究

吴 永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238 千字

ISBN 978-7-01-013863-3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毛泽东评价陕北与延安	1
导 论	3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概况	4
二、本书的主要内容	8
三、本书的解释框架	10
四、本书几个重要概念的界定	12
第一章 1935—1936年中共中央反“围剿”的策略与经验	15
一、国民党对陕北红军的“围剿”与中共中央的军事突围	15
二、中共中央反“围剿”的策略	21
三、中共中央反“围剿”胜利的经验	32
第二章 西安事变及其引发的政治与社会危机	35
一、西安事变前的国内政治生态	36
二、西安事变引发的国内困局	40
三、中国共产党应对西安事变的策略	48
四、中国共产党处理西安事变的经验	60

第三章 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及其引发的党内危机	66
一、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概况	66
二、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给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造成的危机与困境	74
三、中共中央化解党内危机与困境的措施	80
四、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事件的启示	89
第四章 中共中央应对皖南事变的历史考察	91
一、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	91
二、皖南事变造成的困局	110
三、中共中央化解皖南事变困局的策略	120
第五章 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缴“救国公粮”及其引发的社会危机	134
一、抗战中、前期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的征缴概况	134
二、1941年“救国公粮”征缴政策的出台及其主要内容	139
三、1941年“救国公粮”过度征缴引发的问题	144
四、中国共产党应对“救国公粮”问题的对策	149
第六章 克服教条主义，构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156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学习型政党的历史背景	156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学习型政党的基本方略	163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学习型政党的特点	179
第七章 中共中央应对重庆谈判的策略与经验	187
一、重庆谈判的背景	187
二、中共中央应对重庆谈判的策略	201
三、中共中央应对重庆谈判的经验	223

第八章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破解解放战争困局的基本方略	
.....	228
一、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相关背景	228
二、中共中央破解解放战争困局的基本方略	234
三、中共中央破解解放战争困局的经验与启示	254
 第九章 中国共产党应对陕甘宁边区民族与宗教问题的经验	
.....	264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	264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探索	269
三、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工作及经验	273
四、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宗教工作及经验	286
 结束语	301
 参考文献	305
 后 记	314

毛泽东评价陕北与延安

1935年9月20日，在哈达铺召开的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要到陕北去：“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①

1935年10月22日，在陕北吴起镇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②

193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进驻延安后召开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在论及政权建设时，毛泽东强调：“延安工作对全国有影响”，“关于延安的政权形式问题，抗日救国会只是暂时的，这里最好是不派县长，应成立抗日革命委员会，将来要成为苏维埃政权。因为这是我们首都所在地，不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82页。

应与人共管”。^①

1942年12月，在西北高干会议上，毛泽东高度评价延安县在经济困难时期表现出的良好精神面貌：“延安县同志们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②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指出：“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③

1947年3月，当即将离开延安转战陕北时，毛泽东对前来告别的人们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年，动手挖了窑洞，开荒种了小米，学习了马列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干部，指导了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领导了全国革命。现在中国、外国都知道有个革命圣地——延安。”^④

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给延安同志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中殷切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⑤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8—459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④ 转引自《汪东兴日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导 论

研究中共党史，探索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得失成败规律与经验，就不可能回避党在延安13年的发展史。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变为强大、从失败走向成功的关键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的历程中，延安时期历时约为13年。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了一系列危局，化解了一系列困境，领导中国革命实现了两大历史性转变，即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和从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的转变，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与此同时，锻造了一个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并巩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积累了在局部地区执政的丰富经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极大地加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程。对于历史叙事的时间尺度动辄“世纪”而言，13年实在过于短暂。但就是在这惊鸿一瞥的历史瞬间，由国共关系的演化而引起整个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乃至决定了国共两党的历史命运，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从这一点来看，延安时期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还是在整个近代中国历史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是革命的实质。^①任何革命都充满着风险和挑战，社会革命尤其如此。从革命的视角来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① [美] 詹姆斯·R. 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本身就是一部危机史——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以及党自身建设的风险和挑战，绵延不断地构成了一幅波谲诡异的社会历史画卷。然而，正是在如此艰难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究竟采取哪些方略成功化解了诸多危机和挑战？又有哪些宝贵的经验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借鉴？这正是本书所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概况

国外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描写和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是最早宣传和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外国女作家。她写了大量的文章，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情况。其撰写的《中国的战歌》（*BATTLE HYMN OF CHINA*），真实地记载了她在延安以及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中南和华东抗日战场的经历，以及延安的社会生活情况；尤其是在《伟大的道路》（*THE GREAT ROAD—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中，史沫特莱不仅全方位地刻画和描述了朱德在60岁之前的经历，同时也真实地展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经过近10年的观察与研究，她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他们队伍中忠诚的党员，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者到绝大部分的指战员，他们都是全人类中出现的新人，是在旧中国具有全新思想、在当今历史中具有全新风格、高尚情操和坚实理想的新人。”^①同时期，另一位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又译为《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以传记的方式，记录了他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的见闻，向全世界首次公开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爱泼斯坦的《见证中国》以较多篇幅介绍了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并对八路军在前线的抗战情况进行了描写。安娜·路易

① 《史沫特莱文集》，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斯·斯特朗的《中国人征服中国》，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她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的见闻，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状，毛泽东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言论经她报道后，引起世界反响。此外，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韦尔斯的《红色中国的内幕》、许永音的《陕甘宁边区考察》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只是在局部执政，国外关注的重点在国民党方面，因而只限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描述性层面，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国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开始成为常态。目前，国外设有中国共产党历史专门研究机构近百家，研究成果尤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国领先。在延安时期专题史研究中，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大批国外学者所推出的作品^①，从各个方面比较系统地展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面貌。这些作品对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尤其是抗战史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同时，围绕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国外也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影响比较广泛的研究作品，像学术界所熟知的施拉姆的《毛泽东传》、《毛泽东的思想》，菲利普·肖特的《毛泽东传》，特里尔的《毛泽东

① 这些作品主要包括：费正清的《中苏轴心：评毛泽东的中国，党的整风文件（1942—1944）》、费正清与费维恺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林赛（林迈可）的《抗战的中共（1937—1945）》、陈荣发的《进行革命：中国东部和中部的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5）》、施瓦茨的《刘少奇和“人民战争”：1938年建立根据地的报告》、片冈铁屋的《中国的抗战和革命：共产党人和第二次统一战线》、范斯莱克的《中共党史上的统一战线》、孙奎光的《第二次王明路线》、夏夫的《毛泽东和抗日统一战线（1935—1942）》、多里斯的《华北的农民动员和延安共产主义的起源》、霍尔姆的《延安时期的文艺和意识形态》、西博尔特的《延安的群众教育革命》、斯特拉纳汉的《延安妇女和共产党》、施兰的《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华昌明的《延安的妇女和共产党人的活动情况（1935—1946）》、泰韦斯的《整风的起源：解放前党内的清洗和教育》、凯尔卡的《延安时期劳动英雄的作用》、马克·塞尔登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池田诚的《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李德的《中国纪事（1932—1939）》和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所撰写的《延安日记》等。

传》，竹内实的《毛泽东思想》，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白鲁恂的《作为领袖的毛泽东》等作品，对毛泽东的一生及其思想进行了全方位描写与评价，是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精品力作。

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主要着重于三个主题：一是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和政治制度的考察；二是对中共领袖或主要领导人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考察；三是对边区或解放区经济发展及社会发展的考察，其中政治史研究的成分较多。尽管西方对延安时期中共历史研究的成果较为显著，研究范围也较为宽广，但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主体创作史观的制约，他们的研究仅限于一种“客观描述”，无法解释和揭示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革命的表象中。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行评价时，多数国外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他们往往把中国革命的胜利归结为国民党政治发展的失误，认为国民党没有能够及时建立起一个完善、坚固的政治结构，或者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外部政治环境的非常态演变，如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导致国民党无法有效阻遏共产主义力量的快速发展。^①甚至，有的学者还把革命的成败归结为毛泽东和蒋介石个人的人格魅力，明显带有英雄史观的色彩，这显然与事实不尽相符。

在国内，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研究热点，举凡涉及这一时期的专题都有所关注和研究。具体到党的历史研究来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对该时期的历史记述，以资料丰富、翔实、权威而影响较大。尤为令人关注的是，2007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面向全国招标“一史两志”（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的历史、陕甘宁边区志和延安地

^① 参见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98—852页；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205页。

方志)重大课题21项,将之作为“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工程”,计划用10年的时间完成,主要内容包括: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的政治建设史、经济建设史、军事斗争与军队建设史、文化工作史、社会建设史、党的建设史、统战工作史、外交工作史、教育工作史、群众工作史、延安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史、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等各个领域;并计划在2015年之前完成《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专史。目前,部分研究成果已经公开出版,如西北大学梁星亮教授和杨洪教授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对延安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发展作了比较翔实、系统的论述。此外,中共中央党校和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分别把“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危局和化解困境的经验研究”和“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党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经验研究”作为2011年、2012年研究课题,面向全国(党校系统)招标,目前立项课题近100项。这表明,国内对延安时期党史的研究进一步趋于完善。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内尚无党在延安时期的应对危机史专项研究成果,尤其是对这一时期党应对各种危局和困境的经验、教训研究明显不足。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尤其是如何成功应对“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①——这是作为当今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单纯地依靠外部强力所推行的“维稳”,不仅代价沉重,而且效果也并不能令人满意,甚至于适得其反。在此背景下,系统地研究延安时期党应对危局和化解困境的经验,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历史根源上加深对党的先进性本质的认知,为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客观历史依据,而且有助于我们汲取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党治国理政以及促进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①“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指能力不足的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

二、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体背景下，整个近代中国始终面临着巨大的民族生存危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不解决这两大矛盾，中华民族就无法赢得独立和解放。这也是引发近代中国革命的主要原因。任何革命（尤其是社会革命）都因危机而爆发，同时，革命本身也孕育和制造了社会危机。但革命的目标在于推动社会的改良与发展，因而在革命过程中，革命主体的主要任务在于消除和克服现实的危机，使社会重新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就是致力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对于经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巨大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在延安时期能否成功化解各种接踵而至的危局和困境，将直接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命运。

概而言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遇到五大困局，即政治发展困局、经济发展困局、社会发展困局、文化发展困局和党的自身建设困局。

在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最大危局和困境就是党及其领导的革命的合法性始终得不到国民党执政当局认可，在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时刻受到战争威胁，而党内斗争和一些外部因素又导致党内危机不断。在经济方面，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根据地或解放区绝大多数处于穷乡僻壤地带，地瘠民贫，自然条件恶劣，物资匮乏，经济危机不断。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一直是延安时期党所要迫切解决的另一大危局。在社会建设方面，复杂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阶级矛盾、阶层矛盾，以及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实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目标的巨大反差等，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所要积极应对的诸多困境。在文化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左翼文化不仅受到资产阶级右翼文化的围攻，而且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和查禁，即使在解放区内，新文化也始终受到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路线的干扰。能否构建适应民族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时代新文化并牢牢掌握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遇到的又一大困境。而在党的自身建设方

面，党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如何把一个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涣散的党，建设成为一个坚强的、巩固的、统一的、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具体来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遇到十大危局和困境：（1）1935年至1936年，在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下，中共中央和红军被压缩在陕北有限的空间范围内，面临极其严酷的生存危机。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企图在1936年年底之前彻底消灭红军，以结束“戡乱”时期。在东征和西征失利后，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处境异常困难。（2）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并且达到白热化。在日本侵华势力已经控制东北并染指华北的时代背景下，西安事变所带来的国内政局动荡无疑给本就十分深重的民族危机增加了阴影。就中国共产党来说，西安事变不仅仅给党及红军的发展创造了良机，也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3）1937年的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党的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王明在此次会议上错误地解读抗战时期党的方针和政策，人为地破坏党的组织工作，企图取代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拆散长征后逐渐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党内造成了恶劣影响，并由此引发了党内的政治危机。（4）受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和军事封锁、日寇的“扫荡”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从1939年至1942年，整个陕甘宁边区陷于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并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危机，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日趋紧张，社会建设事业受到重创。能否顺利渡过危机，将直接影响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成败。（5）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之前，党内受教条主义的影响至深，统一的思想路线没有形成，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较低，广大党员干部的素质还不足以担负起抗战建国的历史重任。建设一个坚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抗战时期党的建设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6）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和军事“围剿”不断。尤其是皖南事变后，国共矛盾一触即发，国共第二次合作随时面临破裂，中国抗战岌岌可危。（7）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利用外交方面的主动权及其合法地位，在取得西方和苏联的有利支持后，决意以武力实现统一，但为国内

呼吁和平的时势所迫，主动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和平协商建国大略，企图迫使中国共产党接受其全部谈判条件。这一假和平的幌子置中国共产党于政治上十分被动的局面。而国共合作的决裂最终把中国推向内战的深渊，整个国家再度面临分裂危险。（8）解放战争爆发后，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中国共产党受到美国和国民党的双重打压。延安陷落后，中共中央被迫转战陕北。国共分裂深刻影响到20世纪中国的发展走向。（9）整个延安时期，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宗教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共中央。能否妥善解决这两大问题，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局部执政乃至革命的胜败。此外，中国共产党还经受着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局部执政、理论建设等诸多重大历史考验。而这一切，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最终都得以成功化解。

三、本书的解释框架

本书所采用的解释框架主要是历史解释框架。该框架侧重从历史事实出发，在对历史事件梳理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然后围绕问题从各个层面对之进行考据、论证，概括出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再依次努力挖掘各历史主体及其思想、行为对问题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最后，根据主体对问题的处理结果，进行客观评价。当代历史解释学的奠基人柯林伍德指出：“历史学所要发现的对象并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在事件中表达的思想。发现那种思想就已经是对它（事件）的理解了。历史学家在确定事件之后，并没有接着去研究它们的原因。当他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它何以发生了”，因为“一旦历史学家通过在他的心灵中重演行动者的思想而真正地确定、掌握一个历史事实时，这个历史事实已经得到了解释”。^①作为一名“直觉主义”的历史学家，柯林伍德认为，通过“慎思”和“移情”作用，历史是可以“重

^① [英] R.G.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176—177页。